

· 外省人在北京丛书 ·

流浪作家进京的自白

漂泊北京

● 古清生 著



· 外省人在北京丛书 ·

流浪作家进京的自白

漂泊北京

● 古清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北京:流浪作家进京的自白/古清生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1

(外省人在北京丛书)

ISBN 7-5059-2833-3

I. 漂… II. 古… III. 长篇小说: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116 号

书 名	漂泊北京—流浪作家进京的自白
作 者	古清生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1 千字
印 张	1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833-3/I·2116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寻找的足迹

(自序)

一个人活着，就会有很多想法，把这些想法归纳起来，就叫做思想。我想我这个人想法总是不少的，但细细排查，我的想法里头总好像没有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也就是——那种亮闪闪沉甸甸的叫做思想的玩意。

这就比较痛苦。

这也不是自谦，确乎如此，我其实是多么想一下子拥有很多的思想，并且十分大方地拿出来搁进书里：谁要谁拿去用罢。我本不是那么小器的人，虽然从小生长在南方。不过事实上是，我每每在编好一部书稿之际，心里面都略略的有些个不安，因为我确实害怕被人看出——古清生这个家伙虽然也有许多想法，却不能说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没有思想的人，而且是一个文人，那的确是莫大的悲哀。

现在我仍在考虑，如何去获取一些思想。

我是1994年走出南方小镇来到北京做起了自由撰稿人的，以卖文为生。这举动多少有些出格，主要是我在单位党委宣传部干了好些年头，好生生的扔下现成的职业，如今在北京苦巴巴地重起炉灶，讨的是一份比较艰难的生活，确也是有些无事生非罢，因为任什么不想呆在办公室里就可以获取一份生活资源，何以非得逃出来再三折腾？如是真的在北京活不下去，那也是自找，用我们那里的话说，你这是——活大该！

活大该也罢，无论遇着什么情况，我都认了，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阳光、空气、水和粮食，人总是能够活下去的，何况还是一头牛样结实的男人呢。何况还有一门写作的手艺呢。就非常想得开，天不灭我，我自往前走，天若灭我，那当然是天对我有不好的看法，怪我没给他老人家送瓶茅台。其实茅台我有，自个儿悄悄喝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喝酒可以获得一种非常的感觉。

我有时候关在北京的屋子里面壁自省：我跑到北京来到底想干什么？得到了什么？这就令我十分困惑。是的，我现在什么也没有得到，除了流浪生活中的一些体验和在这个时间上产生的想法，以及在这些体验和想法的基础上生发的情感及由这情感炮制的一些文章。

也许我就只能得到这么一点点收获，如果这也算收获的话。我很知足。如果我不知足——那只会徒生苦恼，你还有什么野心？

我来北京的时候，沈从文老先生已经辞世好几年了，这在我心中总是有一些遗憾，如果老先生在世，那无论如何我也是

要去拜访他，小时候把他的书读得如痴如迷，就觉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老先生从湘西跑到北京，花得身上一个银元也没有，而终于成为一个大家——重要的是，他的文章写得那么有趣、纯净而淡泊，这总得是要有一颗忆念的心，一颗想念家乡想到疼痛至深处才写作得出的，这我从赣南奶奶的身边跑到湖北时就有了深刻的体验。然而，我到北京来，也并非就是单纯地想摹仿沈从文先生到北京来做流浪作家，我只是在南方的日子里，生命中总是有一种不安，总是向往着南方山岗以外的世界，那山愈高，这种向往山外的心情就愈是强烈，就愈加不安，我想拜访老先生的想法也就在此，我想问问沈从文先生初来北京的时候，心中是如何想法？很孤独么？会说普通话吗？能吃得惯北京煎饼吗？

唉，我可是愚鲁之至，现在也还没有学会普通话的，还没有学会吃煎饼。

从南方的山群中间走出来，我发现世界果真是大，大得不得了，我怎么也看不过来，像北京这座古老与现代的城市，我感觉是连她天上的云朵都凝结着文化的因子，博大得了不得啊。即便我在北京居住了四年，我现在仍还不能以一颗平常心待她，我仍觉得现在还在苦苦追求她，或许我对她还有那样一种爱憎交织的情感，但我的这种感觉一直很强烈。而最为要命的是，我人在北京，却是在精神上融不进北京，我一直是保持着外省人的心态，这使我与北京始终有着一段痛苦的距离。

不过，我还是为自己毅然走出南方而窃喜，我觉得我已经开始寻找到了一些东西，那就是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当然还没

有积淀下来，它们还处于原初状态，这也是不要紧的，就如我在秋天的山岗上去捡栗子，先是只管捡个够，别的事情留着以后慢慢地再思考，这样的做法总该是对的，我可以自信这一点。我去年回南方去过年的时候，又听到朋友们说故事，我们那山上的一个村落的人，居然在腊月二十三就早早下山来拜年，见人就问新年好，新年发财，弄得大家很是怪异，一问，才知他们在七天前就把年给过了，再深一问，原来是他们村的老秀才把农历给推算错了，就把年提前七天给过了。这当然不是笑话，如果用三百六十五来除以七的话，误差也就在百分之二吧，还算正常误差，山里人又不是天文学家。

走出南方的足迹，便也就是寻找的足迹罢，人活着的时候，总是要寻找一些什么东西，一些想法、一些体验、一些新鲜的感觉、一个生命的机缘——总之这样才好，才足以抚慰自己的心灵。在漂泊的日子里，心情就不会成为一潭死水。

只要我还能走，我就要走下去，一直走到我白发苍苍的时候，那时或许我就会多少有一点点思想了，那时我就要写一本薄得不得了的书，说这个地球就像一只大核桃。

目 录

寻找的足迹（自序）	1
带着方言闯北京	1
我感受到文化的差异性	18
惊心动魄：走险浙江村	47
诗意的居住——往事如烟	181
孤旅行吟——重整河山	188
现实与思考——我的 1995	194
外省文学青年：你为什么悲叹	206
我与“鱿鱼帮”	213
我的棋友们	218
北京正在失去什么	224
“八国联军”围剿下的北京	239
看丹桥夜话	249
漂泊的心情	273

向南方 332

千里归途 337

附录：

古清生：京都的客居作家…………… 牛立明 343

因为流浪…………… 田 柯 348

带着方言闯北京

我学不会北京话
北京是较少方言歧视的都市
我们都嘲笑过方言
北京人说话是一种意识流
北京也应该进行普通话的普及
北京话的随意性

1994年。春天。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站在涌动的人潮中的我像潮水拍打着的一块石头，立定片刻才本能地抬手按按怀里已经揣热的两千块钱，还在么？在！这才毅然扛起伴我多年的那台286老爷电脑走下北京站台，在抬脚的一刹那间，我的一颗心不由得悠了一下，那种体验我至今记忆如初，永远也不会忘却。风很大呀，人很多呀，我扛着电脑左闪右躲试图从人缝中挤出一条道来，那情景犹如旧电影中逃难的镜头，出站的人携着大包小包大呼

小叫地挤啊挤啊——北京站广场上同样嘈嘈杂杂纷乱拥挤，一张张河南面孔山东面孔四川面孔广东面孔交替呈现，北国的太阳懒洋洋地散发出的微小的热力很快被大风夺去——我就开始在心里默念起自己的台词：我将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北京重新开始，北京啊——你会属于我吗？

我在车站广场上停顿了片刻，我想把握一下将来做爷爷时必须回忆的感受，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个对我人生历程有着巨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我居然没能生发澎湃的诗情，没有心潮滚滚没有豪情万丈没有振臂一挥我来也——我只是默默地抬起头迎着午后的阳光向那车站钟塔瞥上一眼，其时为下午1时25分，从武昌至北京的38次特快列车正点抵达北京的时刻。

一伸手一抬足一弯腰钻进一辆面的——去小庄吧，我说。

我在小庄的一个小旅馆包下一个小单间（这哪是什么旅馆嘛，原本就是一个大车店哟）。小旅馆的房头有两棵杨树，其时杨花纷飞有若飘雪。房前则是一丛丛乱草，有很多鸟雀在其间嬉闹。上楼的楼梯是用废铁板焊接的，踏上去有几分弹性。住在小旅馆就着一份《北京晚报》一张《北京旅游图》一包花生米一碟卤猪头肉喝下四两二锅头，心里面悠然升起几许蕴涵京味的暖意，流浪的日子便也从二锅头的瓶口上洞开一缕辛辣又飘逸的醇香。喝完酒扣上衣领手里握住系着一块小铝片的门钥匙走出旅馆的大门（实则只有侧门），围着小旅馆顺时针转三圈逆时针也转三圈，默记下东南西北的出口以及显眼的标志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人民日报》的西大门，我还记住这个丁字路的相邻的车站——它们分别是呼家楼、红庙和水碓子。

熟悉周边地形以后我想我能找到“家”了。

人就非常踏实地回到小旅馆坐在电脑前达达达敲起来。这个时期我计划大批量地写作散文随笔（以后很多打外省来京的朋友向我“取经”时，我便这样告诉他们，多写散文随笔），散文随笔这种文体报纸杂志大量需求而且稿费标准高，用稿速度极快，是流浪文人的首选文体。今天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如果我初到北京一开始就写作中长篇也许我早就因为经济来源的枯竭而打道回府了。嘹嘹！这是我非常得意的一笔哟，我在达达的键盘敲击声里度过了我流浪京都的最初岁月。

北京您好。

上午九点半钟起床太阳还暖暖地晒在床上，小旅馆内人去楼空，我打开电视操练北京语言（我习惯在晚间写作至凌晨）。我的想法基本是这样：用三个月学会说北京话，半年熟悉北京所有街道胡同历史掌故，然后剪去长发理个板寸，嘿嘿，咱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北京人。

这个计划整个儿一个乌托邦。

我走在北京的街上，外省人的情绪像蛛网密布心头。我谁也不认识，谁也不认识我，东逛逛西走走果然一个无业游民。除了购物，我基本上找不着人来对话，我成为一个“沉默的人”（很多年前好像是有这么一部电影的）。我去得最多的是小旅馆马路对面的一个山西人开的刀削面馆。早餐刀削面午餐刀削面晚餐还是刀削面哟。那一段时间我吃刀削面着实吃怕了吃伤了，连我自己都感觉到时时呼出一口浓重的“面气”。只因为刀削面

便宜罢，我吃呀吃呀吃呀刀削面，有一天我写日记的时候不由愤怒地写道：他妈的刀削面，我吃了你尽放刀削屁！

我关起门拉上窗帘坐在电视机前悄悄地学着北京话，北京电视台的播音员说的北京话是相当不错的哦，不过他们的语速过于快了一点，好像是有意不让我跟着学习，即便紧追快赶也赶不上他们的速度。这个我以为是比较好的学习语言的方法不久我便放弃了，太难了太难了甚至不比学外语容易。我那时去琉璃厂就曾遇到过北京农村老太太向外国人兜售竹制的“不求人”（一种挠痒痒的玩意儿，中间还有个小算盘，非常微小和精致），老太太见外国人来了就迎上前去大声吆喝“兔元弯哦兔元弯哦”，这种吆喝的方式我是第一次见到。我当时默默地站在一边品味好半天什么是“兔元弯哦”，但我费了老长时间才明白她，这个“兔元弯哦”就是说“二元一个”吧，我对那位农村老太太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曾经学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外语呢，可我充其量也只敢在那些从未拿过外语课本的自己同胞面前嘀咕几句——而您老人家居然就敢在货真价实的老外面前吆喝！还凭此赚取美元，嚓嚓。农村老太太的英汉混合语给我带来非常之大的乐趣，我感觉时代在变人也在变而且是巨变呐。如是深入考察这农村老太还很先锋的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坛风行一时的先锋派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批评家写作时不也是经常搞点汉夹英么？哦哦，谁又能说先锋派作家是一帮完全脱离生活写作的家伙呢？

学习“弯兔水”真的是不比说北京的“倍儿棒”难。也罢也罢，北京话难煞我也，我这个人患有先天性语言迟钝症哦哨

嘛。那么在北京几年我的北京话到底说到什么程度了呢？检讨起来我自己也不过尔尔，这个世界上谁敢说自己的话就是标准就是规范就是美丽动听呢？然这个世界上仍有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极喜欢吹毛求疵，嚓嚓！1996年春上我和一帮北京青年作家在鼓楼边上的新四川餐馆聚餐，其中有徐坤、邱华栋、赵凝、田柯、丁天、姜丰、狗子和《北京文学》的兴安、谢涛以及《春风》杂志的何平等等。那天丁天带来一位研究汉学的美国博士生，我跟他交谈不过数句，忽然有朋友举筷指出：古清生，你的北京话没有这位美国朋友说得好。此言一出引来轰堂大笑，惟有我尴尬极了——这个携着北京小妞的牙买加裔美国佬居然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然这个事实说明，我在语言学上的愚钝之至已经超越国界。

必然的失败导致必然的坚守。

我为语言搅得疲惫不堪而且这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我个人的历史中这是第二次遭遇语言上的重大苦恼。第一次是我从赣南来到湖北以后，那时候我听不懂普通话，当然那是湖北普通话喽。我记得我从赣南转学到湖北上学，我简直是无法听懂老师的讲课，尤其是算术老师他讲的是天津话，那时候我听天津话真的跟听外语似的。那时候我的母语是客家话，我认为全天下最正宗最好听的是客家话——而本地拐子（拐子，客家话里指蛤蟆，本地拐子就是本地蛤蟆的意思）的语言是非常之难听的，难听得不得了呐。

然而我的客家话在湖北人听起来也是外语，比如我看见门

口有人打得头破血流而高声呼喊“有人打跤喽有人打跤喽”，然听者一脸茫然，甚至不知我何故如此着急。语言的不能沟通其实是很让人苦恼的，因为语言不通即意味着语言这个工具已然失效。在那个时候我曾创造过一个现代天方夜谭——我有一学期的数学期末考试获得0分。当然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稍稍认真一下也不至于考0分的，这里面有几分恶作剧，但不能否认其中有“语言梗塞”所带来的恶劣情绪因素，此绝非为我个人洗刷。

没学好北京话但我仍要总结一番。

我关在房子里私下细细密密地分析：北京话不好学，是因为说北京话要卷舌头，而卷起舌头来说话语音容易含糊，这是我说的北京话没人听得懂的根本原因。卷起舌头说话真的是很费力，我想北方人说话自然卷舌大约是爱吃煎饼卷大葱且从中受到启发所致也。而我从小吃大米，吃大米饭则多半不用卷舌的，也没有受到类似启发，所以我不可能自自然然地卷起舌头说话（我的同乡小说家野莽坚决地认为北京人说话时嘴里是含着胡萝卜，我半信半疑稍作试验发现野莽说的其实是不对的，我嘴里含着个东西时说话更糊涂），问题的关键还是他们习惯卷起舌头说话。操练北京话的失败的确令我尴尬和愤怒，我起先抱怨自己，尔后迁怒于北京话，直至最后我想：我说不来北京话，但北京人也说不来我的话，我凭什么非得放弃自己的语言而改说北京话呢？哦哦，武汉人说：汉剧还是京剧的爹呢。我在《北京文学》举办的顺义笔会上请教先来京的湖北老乡田柯：你学不学北京话？田柯神采飞扬地说，我不学北京话，有成就

的人多半不说北京话。

此言大合我意也！

放弃操练北京话的努力使我如同获得一次灾难深重中的解放。细想想这一切源于心中南方的语言歧视情结。南方小城镇的人均能够操持两种以上的语言，苏州人说苏州话也会说上海话，黄石人说黄石话也会说武汉话。为什么小城镇人到了大都市立即放弃自己的语言？我感觉其中次要的是为交流，主要的是让人感觉自己不是外地人和乡里人，而外地人和乡里人是要“挨宰”的。我在无锡下馆子曾经亲眼见到：我的一份糖醋带鱼是半盘，邻桌当地人的餐桌上是满盘，售价均是八元。从那时起我发现语言是有经济含量的。北京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城市，公认在中国的大都市中最具有文化的包容性的一个城市。可是我在1994年去小庄的电车上听到一个北京人跟另一个北京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两个乡下人站在京广中心前面数京广中心的层数，正兴头上被一帮北京的街痞子看到，领头的北京街痞子说：你在干嘛你是在数京广中心的层数吗？告诉你这是国家机密，上级有规定这楼不准数的，数一层罚款十元，你刚才数了多少层？正数在兴头上的乡下人被这一声怒喝给吓住了，其中一位坦白道：我只数到八层。那好吧，按规定罚你八十元。乡下人无奈只好拿出八十元钱交给街痞子。街痞子接过八十元，又说：以后不要再数了，再数可要重罚的。说罢街痞子们扬长而去，留下两个乡下人站在那里。那位交了八十元钱的乡下人见北京人走远了，才小声对同伴说：跟你说出门不能

太老实，太老实就要吃大亏，其实我刚才已经数到十五层了，这下少罚了七十元钱，怎么样？同伴连连点头道：那是那是，这七十元钱我们可以去喝餐小酒。说罢，乡下人也心满意足地走了，临走亦回首感叹一声：这京广中心真高哦。这个段子不知是真是假，然而我听了心里顿时增加警惕性——北京人也并非只讲礼貌和文明呢，他们也会使坏。

说起来对于都市的警惕性我是从来没有放松过的。除非是小小的采买，在外地城市我一旦要进行大额的购物一定要邀请当地的朋友同行。除警惕经济的欺诈外，体验精神歧视是进入大都市必不可少的一课喽。1987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记忆是：我刚踏上上海的土地就被一位温文尔雅的上海少女用绵绵软语斥之为“侬个乡巴佬”。那时候我已经发表过许多诗歌及小说了，我自己心里还满以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总算是有些档次的，忽然由一位上海少女给我一顶“乡巴佬”的草帽扣上，我心里着实不快。如果是一个上海小瘪三来骂，我足可以一拳将他打入黄浦江去，而少女就不行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以打女孩子呢？我只好把气憋在心里一直憋到现在，每当我踏上上海这个城市我都会回想起那一幕，那镶嵌在记忆符码中的永久的疼痛哦。对于这类遭遇我总是把它归咎于是我说方言所致。假如我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我想我绝不可能受到如此待遇的。假如我能像先锋作家那样偶尔在语句中夹带一两句英语，我也不会遭受如此待遇吧？不过有一次我带队去南京旅游时，我的同事也用方言浅薄下作地骂过南京的服务小姐：利一马一哥一艰一火（注：你妈个贱货）。当时被骂的南京那美丽的服务小姐还